

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资助出版丛书

◎ 之四



跨域史学：近代中国与 南洋华人研究的新视野

黄贤强 著



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资助出版丛书 ◎ 之四

跨域史学：近代中国与 南洋华人研究的新视野

黄贤强 著

厦
门
大
学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跨域史学:近代中国与南洋华人研究的新视野/黄贤强著.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 11

(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资助出版丛书)

ISBN 978-7-5615-3178-5

I. 跨… II. 黄… III. 华人-历史-研究-东南亚-近代 IV. D634.3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53070 号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厦门大学 邮编:361005)

<http://www.xmupress.com>

xmup@public.xm.fj.cn

沙县方圆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89×1240 1/32 印张:9.5 插页:2

字数:260 千字 印数:1~2000 册

定价:24.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寄承印厂调换

出版例言

一、为了促进我国国学研究的繁荣，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组织出版“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资助出版丛书”，旨在鼓励海内外学者在国学领域的深入探索和研究。

一、本丛书的资助出版范围以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章程为依据，围绕着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思想文化产生划时代影响的朱熹理学这一核心，进而探索唐宋以来中国南方的思想文化、政治社会、民生经济、宗教习俗等各领域的演变发展，以及深入研究在朱熹与闽学影响下的闽台及周边区域的历史、文化、社会状况，尤其注重对东南海洋带文化遗产的探讨，对中国文化在这些区域的演进，进行全面系统和深入的研究，努力建构国学研究的东南风格。

一、本丛书面向国际性、专门性研究的学术著作，本着百家争鸣、求同存异的原则，增进不同区域间的学术交流互动与中华文化认同。不同区域的学者各自遵循的学术规范和表述方式必然有所差异和区别，从充分尊重学术交往的立场出发，出版时尽量做到保持原著的面貌，原则上不做过多的更改与硬性的统一，相信读者能够正确地给予甄别和分辨。

一、本丛书采用中文简体字出版，允许对书稿进行合乎丛书体例的调适和出版技术规范的处理。惟征引典籍的个别异体字、通假字以及习用专有名称等姑仍其旧；遇有错讹字予以订正，正字置于方括弧〔 〕内。另须特别说明者，使用〔编者按〕予以注明。

前 言

这本书可以说是我过去十余年学术研究历程的写照：从一个专门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工作者，因为工作场域和研究资料等因素，而逐渐进入海外华人史和南洋华人族群社会的研究领域；再因自我的学术反思，近年又朝向南洋华人与近代中国的互动关系，尤其是南洋华人对近代中国影响的研究方向努力。

20 世纪 90 年代初我到美国进修博士学位，专业领域是中国近代史。1995 年取得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是有关于 1905 年抵制美货运动与中国城市的群众抗争。我的论文强调，虽然学界普遍认为近代中国的群众运动始于 1919 年的五四运动，但具有“近代”意义的群众运动在 20 世纪初年已经发生，而 1905 年的抵制美货运动就是其雏形。取得博士学位后不久，我受聘到新加坡国立大学任教。之所以被聘用，除了我在中国近代史专业领域的研究能力受到肯定外，也可能由于我的博士论文中有一章专门讨论海外华人在抵制美货运动中的角色。因为当时的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更名副其实的系名为汉学系或中华文史学系）正积极发展有关海外华人研究的领域，而我的加入正可以加强这个领域的师资阵容。

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教学的最初几年，我继续从事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因为那毕竟是我“寒窗苦读”多年的专业领域。本书上编“跨域抗争运动——中国近代史的新视野和新史观”的三篇论文，即是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再进一步将研究课题在时空和视野上加以展开及对相关课题作更深入探究的结果。

第一章《动物化文图与近代中国的反教排外运动》主要分析动物化语言和漫画对中国近代群众运动与民族主义运动的影响。过去对清末反教排外运动的研究，多着重于分析知识分子的反教思想和言论，即使有著作论及宣传方式和内容，也多偏重于揭帖和公檄上的文字，而忽略了图画的重要性。本章则追溯 19 世纪以来动物化讽刺文图的发展，并讨论哪些动物常被引用及为何被引用。更重要的是分析在什么历史环境下，不同的动物或同一类动物在不同时期的反教排外运动中，具有什么不同的代表意义。

地方史的研究方法是第二章《1905 年的广州社会文化——从抵制美货运动的几个侧面观察》的特点。中国地域辽阔，各地不只民情风俗有不同之处，政治文化也有所差异。此章论析 20 世纪初期广州社会文化的特殊性，一方面广州从 19 世纪中叶以来，由于鸦片战争的结果和影响，使广州产生相当浓厚的排外氛围，但另一方面广州也很早就展露出其与时代接轨的“近代性”。此章不只从一些事例讨论广州人的排外情结，也特别从一份学术界较少注意的《反美禁工拒约报》的出版和内容来说明并分析广州社会进行文明抵制的近代性意义。

事实上，我在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同时，即已开始关注海外华人的研究。随着研究的深入，我愈发了解到这两个研究领域之间的相互影响。自从费正清(John K. Fairbank)以西方为中心的“挑战—回应”史观在 20 世纪 80 年代受到柯文(Paul A. Cohen)等学者的质疑后，西方学者开始努力以“中国中心史观”来研究中国史。中国的史学工作者更发挥一贯的专长，即从中国的档案和资料以及从中国人的史观来论证史实，即使是涉及海外华人的有关课题也不例外。本书第三章《近代中国与海外华人——1905 年抗美运动研究的新视角》就是要挑战这种研究方法和史观，强调在涉及海外华人的史事和研究问题时，应该也要引用“海外华人史料”并加入“海外华人史观”，以便更全面和客观地了解历史问题，免得轻易落人民族主义的大论述中，认为海外华人参加任何与近代中国有关的活动，都是受到民族

主义的感召和影响。此章以在美国、南洋和澳大利亚的抵制美货运动为例,证明各地海外华人积极参与抵制运动,其动机和方式都和中国境内的情况不可一概而论。在中国境外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优势,除了就地利之便得以补充海外的研究资料外,也易于从发现到的新证据中得以超脱固有的史观,让学术观点能够互相交流和冲击,迸发出更灿烂的火花。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不只是本区域的汉学研究重镇,更是海外华人和东南亚华人的研究基地和中心。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研究东南亚华人或南洋华人课题的条件可说是得天独厚。不仅大学图书馆藏有珍贵的文献和档案,以及早期的海外华文报章,大学当局更是鼓励和大力资助发展东南亚研究,使之成为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最大特色和焦点。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从事研究工作,如果不旁及东南亚研究或南洋研究,实在是暴殄天物,或置身于宝山却空手而归。因此,我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开始教学和研究生涯后不久,除了继续研究中国近代史外,也进入另外一个研究领域,即海外华人史,尤其是南洋华人社会的研究。所谓“海外”,指的是中国以外的所有地区;“南洋”则是有特殊历史含义的地理名词。如果以地理疆域而言,约等于今天的东南亚(Southeast Asia)。由于“东南亚”这个地理名称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因为盟军划分战区之便,才正式被启用,所以,当我们谈到战前东南亚地区的华人时,更符合当时的称法应该是南洋华人。时下虽然流行所谓的“跨国主义”,但滥用跨国主义理论来研究南洋华人,或东南亚各国独立前的华人社会,是不恰当的。研究历史,首要是能置身于当时的历史时空情境。譬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新加坡人往来于新加坡和马来亚两地非常方便,因为它们都是英国的殖民地,而非独立的国家。新加坡华人越境到马来亚,不会说是出国或到马来亚“国”去,而是说去“州府”。所谓州府,即四州府和五州府(即马来联邦和马来属邦,见本书第四章的介绍)。州府是地域概念,而非国家概念。再者,战前中国人到南洋活动,是跨地域的活动,而非跨国活动。南洋是个地域名称,而且是非常有历史意义

的地域名词，而非国家名称。

在英属南洋中，最早被开发的是槟榔屿（现称槟城，为马来西亚的一州）和新加坡两地。英国人先后在 1786 年和 1819 年控制和开垦槟城和新加坡。两地的华人人口日益增多，华人社群组织随之形成。在英国殖民地政府的授意下，华人社会自成一套以华人领袖和社团领导为首的管理系统，在殖民地政府的监督下自行运作。在整个 19 世纪大部分时期，槟城和新加坡分别是马来半岛北方和南方的华人政治、文化、商业和社会活动中心。到了 19 世纪末期和 20 世纪上半叶，新加坡才跃居为整个南洋地区的总枢纽。因为新加坡地处南洋中心，交通方便，是中国南来移民的登陆地和转运站，因此新加坡华人的数量众多且集中，商业发达，使之成为南洋华人的商贸、政治、文化和教育中心。

本书下编“跨域华人社会与政治——从中国到南洋”所收录的九篇论文，主要集中讨论槟城和新加坡两地的华人社会以及中国对当地政治文化的影响。有关槟城和新加坡华人社会的研究，甚至是整体的新马（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已有不少专著和专题研究。但是，令人惊讶的是，至今尚无有关新马华人历史分期的讨论。如果与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曾在过去一段时期的热烈讨论相比较，真是天壤之别。第四章《新马华人近代史分期刍议》即对新马华人近代史的分期问题提出看法，为新马华人史的各种问题的讨论立下基本的时间架构。第五章《近三十年来新加坡的华人研究》则是有关新马华人史学史的回顾和展望。

近代新马华人史始于槟城的开埠。1786 年英国取得槟城的经营和管理权后，开始引进大量移民协助开发经济资源，其中主要包括中国东南沿海闽、粤两省的华民。所以，槟城华人社会长期以来，便以闽南人（当地人泛称为福建人）和广东人（广义地包括广府人、潮州人、客家人等）组成。华人社会的领导权一向由福帮和广帮所把持。最明显的指标是当地两个华人最重要的组织，即 1800 年成立的广福宫和 1880 年成立的平章会馆，一向以来都是由福帮和广帮均分领导

权。但槟城华人社会除了福帮和广帮势力之外,有没有第三股势力?如果有的话,是由何族群(当地称为方言群)所组成,如何组成? 这些问题是第六章《槟城华人社会领导阶层的第三股势力》所要探讨的焦点。

一个社会当然不是由上层领导人所单独构成,我们要对一个社会有更全面的了解,也要探索下层和中层社会的情况。南洋华人社会的下层民众,除了众多的“猪仔”(契约劳工)和自由劳工外,还有一群为人瞩目的“猪花”或娼妓。第七章《槟城的娼妓与华人社会》除了从社会生活史的视角论述槟城华籍妓女的生活空间和日常遭遇外,还特别讨论她们的公益慈善活动,并由此重新评价她们的社会地位。南洋华人中层社会的骨干则是一般的知识分子,他们多数从事教书工作或在报刊杂志社担任编辑和撰稿工作。由于他们掌握了社会的“话语权”,他们的言论也往往代表社会主流舆论。第八章《槟城妇女问题与女子教育——以〈槟城新报〉之论述为中心》呈现了槟城华人知识分子所关注的妇女问题的焦点和心态。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和政治人物的跨域活动,把中国政局和南洋华人社会牵连起来。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从中国流亡到海外的人物如康有为和孙中山等人,都不约而同地将海外华人社会当作他们的“三个基地”,即流亡避难基地、筹措财资和人员基地,以及策划变革大计基地。近代中国大时代变革的斗争场域,由境内延伸到海外。不只满清驻外官员、康有为和孙中山等人在进行着三角交叉的斗智斗法,英国殖民地政府和日本友人也被牵涉在中国的政治漩涡中。第九章《康有为与孙中山在新加坡——论日本刺客事件》回顾1900年发生在新加坡的一场戏剧性事件,探讨到底康、孙共同的日本友人宫崎滔天等人来新加坡是要刺杀康有为?还是要来撮合康有为和孙中山?英国殖民地政府在整个事件中又扮演何种关键性的角色?这个中国近代史上的罗生门事件,有必要从英国人的资料和视角来进一步解读。

孙中山在南洋各地的跨域活动促使海外华人民族主义的兴起,

这看法已是学术界的共识。第十章《孙中山在檳城的革命团体及其互动模式》是以檳城为个案研究，分析孙中山的支持者是如何具体地将孙中山的政治理念落实，如何组织三个革命团体和机关，并且分工合作和互相支援。孙氏“三位一体”的革命事业动员模式，成了孙中山在海外推行革命运动时惯用的策略，这种革命组织和宣传模式在新加坡也如出一辙。第十一章《同德书报社与孙中山精神在新加坡的传承》则探讨孙中山在1925年逝世后，孙氏三位一体中的新加坡同德书报社，如何挑起重担，肩负起在当地传承孙中山精神的重要使命。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因为外在大环境的影响，新加坡的社会和政治面貌有了崭新的发展。在世界各地的反西方殖民统治浪潮冲击下，再加上战后共产主义和左派势力高涨，新加坡的社会也受到影响。第十二章《战后新加坡社会变迁中的劳工运动》就是讨论新加坡从殖民地过渡到1959年取得自治邦地位，再到1965年成为独立国家的阵痛期间所发生的一连串社会和政治问题。由于马来亚于1957年独立（1963年扩大为马来西亚），新加坡也于1965年独立，当地华人的身份认同有了明显转变，分别成为马来亚华人（马来西亚华人）和新加坡华人。“南洋”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地理概念名称也在这个时期逐渐不再使用，取而代之的是“东南亚”。它是东南亚地区各个享有独立政治主权的新兴民族国家或多元民族国家的总称。

如果说上编的三篇文章是我原来的学术专业领域的研究成果，下编的九篇文章就是我跨越学术领域后的研究论集。前者属于中国近代史范畴，后者是南洋华侨华人史或新马华人史范围。这样的研究历程也带给我不少困扰，因为尽管南洋华人的史事研究与中国近代史有密切的关系，但南洋华人研究的主体毕竟还是地方本位的研究，研究当地的社会和政治文化等，所要参考的档案和史料，以及所要注意的学术论著和文献，都和中国近代史领域的要求不同。横跨这两个学术领域的研究，就如同时开辟两个战场一样，倍感吃力。让我感触特别深刻的是，参加历次国际学术讨论会的时候，发现出席中

国近代史学术讨论会的往往是一批熟悉的学界朋友,而参加华侨华人学术研讨会的往往又是另一群学界朋友,这两批学者甚少有机会在同一个学术讨论会的平台上交集,因为这两批学界朋友的研究议题和关心的领域有明显的不同。

上述的困惑促使我思考一个问题,有没有任何学术课题可以让我同时结合我所关心和感兴趣的两个领域,同时又能充分利用我在这个两领域的知识和研究资源。几年前终于发现了伍连德:一位在中国医学界被尊称为“近代中国医学先驱”的人物。同样一个人物,在新马地区却是以“海峡华人三杰”之一(三位最杰出的当地土生土长的华人之一)闻名。尽管如此,直到两年前我在苏州大学一场晚清国家与社会学术研讨会上发表有关伍连德的论文前,中国近代史学界除了从事医学史的工作者外,没有多少人知道伍连德。而在新马地区,他的名气和事迹也不如另外两杰(曾担任过厦门大学校长的林文庆和撰写《新加坡华人百年史》的宋旺相)为人所熟悉。事实上,这位生长在槟城,获得英国剑桥大学医学博士学位,曾在南洋和中国做过一番大事业的世界级“鼠疫斗士”,在近代史上的地位应该要比现在所知的来得更重要。掌握了这个发现,我终于找到一位足以让我进行跨域研究的人物:他是一个在南洋和西方奠定学术和事业基础,却成就更大的事业于中国的知识分子。

经由对伍连德的研究,我也对有类似身份背景,且在不同领域对近代中国做出不同方面贡献的南洋人物开始注意和研究。比伍连德年长廿二岁的同乡辜鸿铭和比伍年长七岁的印尼(当时称为荷属东印度)华侨李登辉也受到我的关注。辜鸿铭在槟城接受英语教育,在欧洲完成文学和哲学专业训练,来到中国后,不只因为长期在张之洞幕府服务受人瞩目,更因为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固执和对中西文化交流的贡献,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留名。李登辉在新加坡接受英文教育,留学美国耶鲁大学,回到中国后,为复旦大学的创办和经营,立下汗马功劳。伍连德、辜鸿铭和李登辉等南洋华人知识分子,当年为何来到对他们来说不只是环境陌生,而且也语言不甚通的国度。答

案绝对不是老生常谈中所谓的“爱国华侨回国贡献和建设祖国”论述这么简单。探究南洋知识分子到中国的真正原因，正是第十三章《南洋知识分子与晚清国家和社会——再发现辜鸿铭、李登辉和伍连德》的核心问题。

第十三章也是本书续编“跨域知识分子——再发现南洋与中国”唯一的一篇文章。所谓再发现南洋与中国，表示我正努力寻回与南洋及近代中国有密切相关的历史记忆或长期受冷落的史实和人事；所谓跨域知识分子，是指像伍连德、辜鸿铭、李登辉，还有林文庆等跨地域、跨专业领域的杰出人物；列为续编，表示在我完成上编和下编的研究历程后，正继续努力朝向一个崭新的研究方向。第十三章不是结束章，而是我研究里程碑的另外一个起点。有关伍连德等南洋知识分子的其他方面的深入研究还在进行中。

总的来说，这本书从研究对象的活动空间而言，无疑是跨地域或跨疆域的，它涉及中国、南洋和欧美等地。从研究方法的范畴而言，是跨学术领域的，除了传统史学研究方法贯穿各章外，有些文章也辅以历史人类学的田野考察和查访、社会学的统计和调查、政治学的劳资理论学说、口述历史记录、生活史、地方史和性别史等研究方法。既然本书是跨地域和跨领域的史学研究成果，乃定书名曰：跨域史学。而副题则强调此研究是以新的视野来探讨近代中国和南洋华人社会的互动关系。

目 录

前 言

· 上 编 ·

跨域抗争运动

——中国近代史的新视野和新史观

第一章 动物化文图与近代中国的反教排外运动·····	1
一 前 言·····	1
二 19 世纪后期的动物化文图 ·····	3
三 20 世纪初期的动物化文图 ·····	13
四 结 论 ·····	24
第二章 1905 年的广州社会文化	
——从抵制美货运动的几个侧面观察 ·····	26
一 前 言 ·····	26
二 广州的排外传统和反美情绪 ·····	27
三 艾丽丝访问广州事件 ·····	30
四 《拒约报》与广州的抗争文宣 ·····	35
五 结 论 ·····	42

第三章 近代中国与海外华人

——1905 年抗美运动研究的新视角	44
一 前 言	44
二 美国华人与近代中国:抵制美货运动的形成	47
三 英属新马华人与近代中国: 从抵制美货运动到革命运动	54
四 澳洲华人与近代中国:保皇会与抗美运动的关系	61
五 抵制运动:海外华人与中国近代史	65
六 代结论:三个问题的反思	70

· 下 编 ·

跨域华人社会与政治

—— 从中国到南洋

第四章 新马华人近代史分期刍议	72
一 前 言	72
二 华人近代史分期的依据标准	74
三 新马华人近代史前段各期的特点	76
四 新马华人近代史后段各期的特点	82
第五章 近三十年来新加坡的华人研究	88
一 绪 言	88
二 新加坡的华人研究基地	90
三 学报的出版	94
四 丛书和纪念特刊	96
五 回顾与展望	100
第六章 檳城华人社会领导阶层的第三股势力	102
一 前 言	102
二 19 世纪檳城华人社会的领导阶层	103
三 檳城的客籍副领事	107

四	槟城华人社会第三股势力集团的形成·····	114
五	结 论·····	116
第七章	槟城的娼妓与华人社会·····	117
一	前 言·····	117
二	移民社会的历史背景和妇女南来的原因·····	119
三	槟城的红灯区·····	122
四	娼妓问题与社会舆论·····	124
五	妓女与鸨母及嫖客的关系·····	127
六	妓女与私会党及警察的关系·····	135
七	娼妓参与的慈善事业·····	138
八	结 论·····	142
第八章	槟城妇女问题与女子教育	
	——以《槟城新报》之论述为中心·····	145
一	前 言·····	145
二	议论文字的性质和数量的分析·····	146
三	女子教育问题·····	148
四	结 论·····	155
第九章	康有为与孙中山在新加坡	
	——论日本刺客事件·····	168
一	前 言·····	168
二	日本“刺客”南来的情报来源及 海峡殖民地政府的认知·····	171
三	海峡殖民地政府为何很快地“抓放”日本刺客?·····	174
四	英国政府对革命派和改革派的看法·····	178
第十章	孙中山在槟城的革命团体及其互动模式·····	182
一	槟城三大革命团体的成立·····	182
二	槟城三大革命团体的关系·····	188
三	辛亥革命史中的槟城革命团体·····	191

第十一章 同德书报社与孙中山精神在新加坡的传承·····	196
一 前 言·····	196
二 孙中山与同德书报社·····	198
三 同德书报社的领导层·····	202
四 同德书报社与纪念孙中山的活动·····	206
五 结论:孙中山精神在新加坡的传承·····	216
第十二章 战后新加坡社会变迁中的劳工运动·····	220
一 前言:劳资关系之基本理论·····	220
二 战后工运发展的三个阶段·····	225
三 劳工运动的后现代论述:浪漫剧的角色解读·····	239
四 结 论·····	250

· 续 编 ·

跨域知识分子

——再发现南洋与中国

第十三章 南洋知识分子与晚清国家和社会	
——再发现辜鸿铭、李登辉和伍连德·····	251
一 前 言·····	251
二 南洋知识分子与晚清国家和社会·····	252
三 晚清招揽人才政策和南洋知识分子回国的机缘·····	259
四 余 论·····	266
参考书目·····	268
后 记·····	289

第一章

动物化文图与近代中国的反教排外运动*

一 前 言

中国人自古以来习惯用禽兽来比喻那些不知忠孝礼仪的人,如《孟子·滕文公》下篇提到:“无父无君,是禽兽也。”《礼记·郊特牲》中也提到:“无别无义禽兽之道也。”这种把人和禽兽类比的用法,主要是劝人注意个人修养,遵守社会道德规范,免得沦为禽兽之类。到了20世纪,动物化讽刺文图则已发展成为社会和政治运动中的一种有效煽动工具,对近代中国群众运动的兴起有重要的影响。例如,在1908年因二辰丸事件而引起的反日运动中,海内外中国人宣传抵制日货,遍发传单,将那些不肯合作者诋为凉血动物。^①其中一份传单

* 本文初稿《动物化文图与清末反教排外运动》,原载于(台湾)《清华学报》,新28卷第4期(1998年),页461—485。

① 有关二辰丸事件及随之而来的抵制日货运动,见菊池贵晴《第二辰丸事件の対日ボイコット》,《历史学研究》1957年第209期,第1~13页;Wong Sin-kiong, “The Tatsu Maru Incident and the Anti-Japanese Boycott of 1908: A Study of Conflicting Interpretations.” In *Chinese Culture*, 34:3(1993), pp. 77~91.